

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思想底蘊

建構中國“澳門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齊鵬飛**

自 2010 年以來已經連續舉辦了七屆的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是第一次聚焦於“‘一國兩制’與澳門學”這個主題來展開研討。我認為，這對於我們“澳門學”的深化研究是大有助益的。因此，今天我也想借本次參與研討的機會，談一點個人的想法和看法。我發言的題目是：以“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思想底蘊，建構中國“澳門學”的自主知識體系。

大家都熟知——近四十年來，在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中由澳門本地學者率先提出和大力倡導的“澳門學”研究，取得了可謂是令人矚目的重大進展和突破。無論是在“澳門學”概念和理念之界定和釐清，在其研究對象、研究重點、研究範圍和研究邊界之梳理和闡釋，在其研究方法、研究路徑、研究工具之提煉和總結，在其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之歸納和概括，在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建構方面，所逐步形成的一些獨到思考、獨到見解，還是在其所圈定的“澳門學”研究領域所湧現和積累的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及其產生的比較大、比較好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使其成為通常意義上的“澳門研究”中的一個最具標識度、彰顯度和指向性的學術流派和學術現象，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而“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今日之成就和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必須提及的：一個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放置於具有深厚底蘊和豐沛資源的澳門歷史和澳門文化這兩個特定的場域；一個是“澳門學”研究的首倡者

* 在第七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

**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及其附議者，從一開始就將其研究視閥放置於“中西交匯交流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之“全球史觀”和“全球化史觀”之理論維度，努力推動實現此一“地域學”的“本土化”“中國化”和“國際化”。

但是，同時也必須明確指出的是，迄今為止，澳門的“澳門學”研究，距離學術繁榮的理想目標還遠遠在路上，其學術探索和理論探索尚未全面完成從自在到自為、從自發到自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三大體系”包括自主知識體系尚未全面完成有機構建而蔚為大觀的基礎任務。

造成目前“澳門學”研究這種缺憾的制約單元，同樣是錯綜複雜的，如背後至關重要的經濟因素——不僅僅有澳門微型經濟體之偏小、偏弱的經濟體量及其影響力，而且還有長期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對外形象等。同樣，我們回到“澳門學”研究本身檢視，也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諸多令人思想困惑之處。我們以“澳門學”研究的基本問題為例——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在長期的學術爭鳴和理論探討過程中，已經取得一系列主要聚焦於“三大體系”構建方向上的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如以“綜合”和“交叉”為“特色”以及以“特色”建“優勢”，如不僅要“往回看”而且要“向前看”，如不僅要“國際化”而且要“中國化”，等等。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已經敏銳地觀察和意識到，初始狀態的“澳門學”研究與可以比附的，但早已成為一門比較成型和成熟之國際顯學的“敦煌學”研究之間巨大的差異性。這都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其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且至關重要的重大缺憾，也是本人長期如鯁在喉而不吐不快的——那就是“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與“澳門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問題。不否認，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也並沒有漠視“一國兩制”因素在“澳門學”研究之“三大體系”建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對於兩者的關係，相當一部份學者還有頗具思想深度和理論高度的學術探討和闡釋，但是就整體性而言，以澳門本地學者為主體的“澳門學”研究者，對於將“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作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作為“澳門學”研究的基礎支撐和主要驅動力的思想自覺、理論自覺、學術自覺，還是有比較大的欠缺的。為甚麼要突出強調這一點？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沒有“中國故事”、“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就沒有“澳門故事”、“澳門經驗”、“澳門智慧”；沒有“一國兩制”，沒有澳門回歸，就沒有“澳門學”！脫離開了祖國內地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付諸實踐的大背景和驅動力，脫離開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建構即澳門回歸和“新澳門”建設的大背景和驅動力，亦即脫離開了“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所謂的“澳門學”研究之“三大體系”構建，勢必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為甚麼如此說？理據是甚麼？

其一，澳門回歸，是“澳門學”孕育和發軔的大背景和主要驅動力

這裏，有我們必須關注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澳門學”的發軔、“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直接的誘因和驅動力，就是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在澳門問題和澳門地區的付諸實踐，就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探究“澳門學”的歷史底蘊和亮色，這是繞不過去的門檻。

澳門回歸，也就是中國中央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將其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徹底結束其被葡萄牙殖民統治的屈辱歷史、徹底結束其與祖國內地分離而長期孤懸海外的悲慘歷史，是澳門開埠以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歷史轉折點，它昭示着，澳門從此將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直轄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與祖國內地有機融為一體，共同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攜手奮鬥；澳門同胞從此將真正成為這塊土地上的主人，與祖國內地一起共同享有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偉大榮光。而且，澳門回歸是“一國兩制”模式的澳門回歸，“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之核心要義和基本特點，是“一國”與“兩制”的有機統一，“求一國之大同、求兩制之大異”，不僅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祖國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國澳門建設好；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是“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權”與“保障澳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統一，是“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澳門自身競爭力”的有機統一。同時，澳門回歸還是在澳門“廢除殖民主義”和“保留資本主義”的有機統一。因此，我們講——“一國兩制”是中華文明發展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和偉大貢獻，有機構建了和平與發展時代國與國之間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實現民族國家統

一、中央與地方之間不同社會制度共存共生的新模式。我們講：“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澳門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且也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在這種解決方案和制度安排下，澳門歷史發展中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方面所積累積澱的一些不可替代之“優勢和特色”將得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當然，必須適應澳門回歸的歷史性轉折在“一國兩制”的新時代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澳門回歸，不僅是政治回歸、法理回歸，而且也是文化回歸、學理回歸，亦即人心回歸。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也對澳門同胞提出了適應這一偉大歷史性轉折完成“去殖民化”而有機構建“一國兩制”新時代的澳門新文化的歷史性課題。

也就是說，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直接催生了澳門同胞當家作主的主體意識的萌發，催生了澳門同胞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家意識的全面復蘇，催生了澳門同胞重構以“中西合璧”與“不同而和、和而不同”以及“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為底色和亮色的澳門文化之中華文化主體、主流和統領地位的思想自省和自覺，催生了澳門同胞在迎接“一國兩制”新時代進行澳門新文化建設進程中“去殖民化”、“去西方中心化”而重新建立“中國澳門”本位的澳門文化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的學術自省和自覺。其率先探索和突破的領域就是澳門文化的意識形態主陣地——“澳門研究”。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全新的思維、全新的範式，對於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對外關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進行適應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一國兩制”新時代的重新審視和重新梳理、重新闡釋，這一歷史任務，就成為愛國愛澳的澳門同胞尤其是澳門本土的文化人和學者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而“澳門學”概念和理念的醞釀和破土而出，就是其中最直接、最強烈的歷史回音。

其二，“一國兩制”建設，是“澳門學”持續深化研究的基本支撐力和主要營養劑

澳門回歸以來，在“澳門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進展和重大成就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繁盛景象的同時，關於“澳門學”問題的深化研究，亦即“澳門學”研究的“三大體系”構建的工作，也在持續推進，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新局面，迎來了“澳門學”大討論的第二次高潮、第三次高潮。

“九九”回歸以來的二十餘年間，澳門的“澳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比較大、比較好的成就和影響力，有三個至關重要的背景性、基礎性、支撐性的條件，是不能漠視和回避的——

一是“九九”回歸前停滯不前陷入嚴重困境的澳門經濟在“九九”回歸後重新煥發了青春，走出了一條繼續保持祖國內地對外開放之“窗口、橋樑、國際通道”的“傳統特色”和“區位優勢”，全面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和“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的經濟發展新路，創造並維繫了年均兩位數的“超高速”經濟增長態勢，經濟總量、經濟實力、經濟影響力攀升至其經濟現代化之旅啓程以來的最高點。

二是祖國內地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 2001 年“入世”以來經濟快速、高速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地。也就是說，正是“九九”回歸以後在與祖國內地共同推進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澳門”的經濟總量、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包括知名度才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新高點。

三是“九九”回歸以後，“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成為“一國兩制”偉大試驗中的“模範區”和“示範區”。

對比“一國兩制”偉大試驗的率先垂範地——“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儘管“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也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但是同時其行穩致遠則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和巨大困難，出現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因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長時期“一國兩制”實踐步履維艱，與“九九”回歸後的澳門“一國兩制”實踐一路凱歌行進，形成比較鮮明和強烈的對比，不能不令所有真正關心“一國兩制”前途和命運的人們對於“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一度的“亂”和“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長期的“治”，陷入深深的思考；對“九九”回歸以後“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作為主流價值觀的“愛國愛澳”根本原則深入人心，“愛國愛澳、包容共濟、務實進取”的優良傳統即“澳門精神”發揚光大，全面實現“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有機統一，全面實現“三個有機結合”和“三個不可偏廢”的成功之道，陷入深深的思考。

也正是由於“九九”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之巨大成就和巨大成功，“一國兩制”新時代的“澳門研究”尤其是澳門的“澳門學”研究，就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和比較充分的支撐和保障條件，有了比較新鮮、比較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思想內容，“一國兩制”因素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的客觀地位和作用也被進一步強化 and 彰顯。對比“九七”回歸前被熱議的“香港學”在“九七”回歸後的歸於沉寂，“九九”回歸後澳門的“澳門學”則恆溫不減，始終是相關學者的思想興奮點。

其三，“一國兩制”因素，必須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通過對回歸前和回歸後近四十年的“澳門學”研究的學術史梳理，我觀察到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近四十年來，關於“澳門學”研究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或曰基本局限在以“澳門學”為關鍵詞的各種專題研討會、各種專題論文集、各種專欄文章中。當然，通常意義的“澳門研究”，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是涉及到“澳門學”相關問題的。但是無論是1999年以前關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指導的澳門回歸史的研究，還是1999年以來關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史的研究，總體而言，其中“澳門學”研究的探討是有意無意地缺位的。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講——迄今為止，“一國兩制”因素還並沒有被自覺和有機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閥和範疇，還並沒有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更遑論作為其底蘊、亮色和主基調。突出者如目前澳門的“澳門學”研究，相關學者比較多的關注，是其中中西兩種文化、兩種文明交匯、交流、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而比較少地關注澳門與祖國內地“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相互碰撞、相互磨合、相互交融而“多元兼容、互動共生”的大背景問題。那麼，我們極言之，如果這一重大缺憾、重大疏離不能從根本上、從整體上及時彌補、及時校正的話，已經在路上的“澳門學”研究究竟還能再走多遠、走多深，可能都是個疑問。

自20世紀80年初中國中央政府“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和方針政策出台並付諸實踐以來，“一國兩制”之“澳門模式”的探索和構建，經歷澳門回歸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和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後“開創澳門新紀元”的全面建設，在取得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

積澱了極其豐富而深刻的成功經驗——包括面對和破解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各種矛盾和困難的成功經驗。澳門回歸和“一國兩制”建設給澳門歷史發展所帶來的翻天覆地、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和深遠影響，不僅是澳門的“澳門學”孕育和發軔的基本背景和主要驅動力，是“澳門學”持續深化研究的基本支撐力和主要營養劑，而且也應該和必須被自覺和有機地納入“澳門學”研究的視閥和範疇，真正成為“澳門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份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成為“澳門學”研究的底蘊、亮色和主基調。成為“澳門學”研究源源不竭的資料庫和資源庫。

“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即“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的探索和試驗，歷史性地構建了“兩個大局”時代背景下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中華文明”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路徑”、“新樣態”、“新範式”——即“一國兩制”文明範式。

那麼，甚麼是“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對此，我始終堅持這樣的理解和闡釋——所謂的“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事實上包括有兩層涵義：其一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前的“國際爭端解決模式”和“國家統一模式”；其二是指“九七”、“九九”港澳回歸後的“國家治理模式”和“中央和地方關係模式”。當然，無論就那層涵義而言，即不管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通過當事國之間的外交談判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和主權爭端問題；還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治理，通過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大框架、大範圍內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之間、祖國內地與港澳地區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圓滿解決港澳地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基礎和前提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問題，都是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全新試驗——誠如鄧小平先生和習近平主席所論——“‘一國兩制’，馬克思沒說過，世界歷史上沒有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在統一的國家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個別地區依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在過往的人類政治實踐中還從未有過。”“‘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民族國家的國家統一和國家治理理論與實踐創新性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

人對於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的“政治多極化、經濟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當代世界創新性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華民族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歷史遺留問題提供的富有傳統哲學智慧的中國方案！”“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所構建的“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的巨大價值和意義也正是念茲在茲。

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文明範式，為澳門的“澳門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應該同時也必須參照的歷史坐標系，積極回應這一時代呼喚，將為“澳門學”研究創造廣闊的學術發展空間和學術發展可能。